

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

从“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到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物质富裕篇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发展。共同富裕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同低生产力水平并存。如果“蛋糕”本身就很小，那么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都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更可能面临的是共同贫困。因此，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是驰而不息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强调“结合浙江的实际，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推进我省的物质文明建设”。这些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物质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后的浙江，在原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贫乏的现实条件下，迅速成长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实力最强、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与此同时，许多矛盾也在浙江先发展，到本世纪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困境，突出表现为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带领4700多万浙江人民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成为当时的重大课题。经过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八八战略”，并结合浙江实际部署推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浙江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一)提出“努力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着力推动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不断上规模、上水平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的基本原则，也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体制机制优势。2002年底，浙江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到406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3%，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浙江的公有制经济也发展得很好，全省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不含金融企业)列全国第六；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分列全国第一和第二；不良资产占比比重全国最低。在这一背景下，“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指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助推共同富裕的稳定器、压舱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浙江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提出“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的布局 and 结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提高省属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浙江省在2006年基本完成省属国有企业改革，与2003年相比，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量(不含金融企业)排名提升一位，居全国第五；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和第二，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之一。2002年底，习近平同志就曾指出：“浙江最大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先发优势，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把这个优势发挥好。”2004年，他主持出台《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明确了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多项政策措施。在2006年6月的浙商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浙商和共同富裕的关

系，强调“浙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开拓者，是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贡献者，是浙江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到2006年，根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浙江上榜企业203家，居全国第一，较2003年增加20家，一批影响巨大的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走上快速发展壮大之路。

(二)强调“真正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着力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强劲动力源泉，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起到引领带动和关键支撑作用。进入21世纪，浙江在总体上仍然延续20世纪末以来形成的投资驱动型增长，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不加强的趋势。习近平同志敏锐洞察到这种变化，作出“我省进入了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时期”的判断，强调发挥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幂数效应”，部署实施“八大科技创新”工程，不仅把重点放在工业和先进制造业上，而且统筹兼顾农业、生态、海洋、健康与安全、服务业科技创新，特别是把基础研究及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纳入科技创新重大工程，使浙江的创新发展具有了更强的战略眼光和超前思维。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浙江围绕“八大科技创新工程”集中实施26个重大科技专项，到2006年底，浙江获国家科技奖的重大成果数量从2002年的6项增加到12项，专利授权量从1.4万件增加到3.1万件，科技活动经费从185.2亿元提高到407.8亿元。

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是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和生力军。出于历史原因，浙江缺少大院大所和著名大学，这成为自主创新的突出短板。习近平同志始终把解决这个问题摆在重要位置，2003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的战略部署，并亲自协调组织引进清华大学等大院名校与浙江共建创新载体，从而有效破解了科研与市场的对接难题，成为全国省校合作的典范、产学研合作的样板。他还注重引导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支持企业成为引进大院名校的主力军。“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战略实施的三年里，浙江与国内外大院名校引进共建创新载体近300家，90%以上都是以企业为主体引进共建的，由此为浙江引进了3200多名省外技术人员，超过了原有省属科研院所的人才总量。

习近平同志把“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高瞻远瞩地提出推进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推出省特聘专家制度、“钱江人才计划”、“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等一系列引才育才聚才政策，为浙江的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至2006年，全省各类人才达524.7万人，每万人中拥有人才1071人。

(三)强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着力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

努力形成既能节约资源又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必由之路，是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产业根基。党的十六大后，浙江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农业经营出现副业化、兼业化、老龄化趋势；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并集中在块状经济，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环节的“轻工小集加”仍然普遍存在；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一直徘徊在40%左右，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相比，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偏低。为此，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7月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以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途径。按照‘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要求，着力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并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作出系列部署，推动浙江从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以集约型内涵式的发展为主，在质的提高基础上实现量的新扩张。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全面分析浙江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新形势，指出“提高农业效益、建设现代农业，面临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和农产品流通方式落后的制约”，作出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决策，既顺应了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又贴合人多地少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特殊性，充分发挥浙江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轻工小集加”是浙江工业的重要特征，具有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低成本、高效益的比较优势，以及小企业、大协作的集群效应，但也存在产品技术含量偏低、附加值和美誉度不够高等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充分发挥和不断增强这一优势，但决不能满足于这一优势，停留于这一优势。”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作出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部署，主持制定《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以高技术、临港化工产业为主的环杭州湾产业带，以轻工、医药、机械为主的温台沿海产业带，以传统优势产业和资源深加工产业为主的金衢丽沿高速公路产业带，构建起浙江生产力布局的基本形态。在这个整体性、长远性工作部署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关键是把握‘先进’二字，结合浙江实际，这种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现代化促进信息化，加快建设‘数字浙江’”。2003年9月，浙江出台《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2007年)》及一系列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将信息产业作为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 and 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数字浙江”战略指引下，“十一五”时期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年均增速27%左右，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龙头企业成为浙江经济的新名片。

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具有科技含量高、劳动生产率水平高、附加价值高的“三高”特征。2004年12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我们要遵循规律，抓住机遇，将服务业逐步培育壮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产业’，以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来促进工业化水平的加快提升，同时藉以解决要素制约、就业压力等问题”。按照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扶持等四方面工作导向，浙江初步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态势。从2002年到2006年底，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9.7%，四年间翻了一番左右。

(四)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发展的必然要求”，着力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竞争力

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竞争，是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和总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的关键，能够不断打开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向外发展的商业氛围。改革开放后，大量浙商到省外经商，出现“千万浙商”的概念，社会上对“浙商要不要走出去”看法不一，很多人担心大量浙商向外发展可能造成浙江经济“空心化”。针对这个疑虑，习近平同志提出“地瓜经济”的比喻，认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地，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形象地阐释了在外浙商与浙江经济的紧密关系，对平息争论、推动浙江经济向外拓展与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对外开放。2004年3月，他主持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后一个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转变，特别注重“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并开创了到境外举办“浙江周”的先河。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带队赴国外推介浙江、加强经贸合作，主动向世界展现浙江形象，搭建招商引资平台。从2002年到2006年，浙江进出口总额从420亿美元提高到1391.5亿美元，年均增长34.9%；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从47亿美元提高到88.9亿美元，年均增长17.3%。

在大力推动对外开放的同时，习近平同志还以长三角一体化为抓手推动对内开放，在“八八战略”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为推动这一构想落地，2003年3月，习近平同志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江苏开展学习考察，倡导建立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随后，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按照“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的总体要求，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2005年12月，首次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杭州召开，长三角合作进入实质化阶段，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交流机制促成优质项目、业态、人才、资源进一步汇集到长三角区域内，为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经济竞争力打下良好基础。

(五)提出“我们应该看到丰富的山海资源优势，念好‘山海经’”，着力把欠发达地区和海洋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打通欠发达地区山海资源向物质财富转化的通道，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同志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结合浙江多数欠发达地区位于山区和海岛的实际，在“八八战略”中明确将“山海协作工程”作为省域未来重要战略举措深入推进，自此后浙江打开了以海引陆、以陆促海、海陆统筹、海陆联动的整体发展新格局。

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着眼于全省生产力、人口、资源等区域布局优化，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借助结对帮扶、优势互补，不仅为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也为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拓展了新空间。2003年，浙江省委在衢州开展“山海协作工程”第一次系列活动，浙江省政府专题成立山海协作工程领导小组，明确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65个对口协作关系，出台《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习近平同志多次到浙西南山区调研山海协作情况，每年主持召开山海协作情况汇报会，亲自谋划工作思路，亲自部署工作任务，亲自督导重大项目。以衢州市为例，2007年该市山海协作项目从业人数达到5.1万人，实现报酬7.1亿元，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报酬增量的30.2%，切实带动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增收。

浙江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统筹区域发展既要山海协作，也要向海图强。习近平同志前瞻性地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意义，强调“在海陆联动中发展海洋经济，使海洋经济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他指出，“纵观世界经济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在2003年8月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正式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明确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港口城市为依托，以港口建设和临港工业为突破口的海洋经济强省发展思路，并在《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中进行了体系化部署。自带头，2006年底

舟山市船舶工业产值达到107亿元，是2001年的9倍，弥补了舟山作为偏远海岛地区的工业发展短板，有效带动了经济发展。

(六)提出“既要GDP，又要绿色GDP”，着力将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既满足当代需求，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延绵福祉，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可逾越的底线。进入21世纪，浙江生态环境压力已逼近临界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2004年3月，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浙江人多地少，如果走传统的经济发展的道路，环境的承载将不堪重负，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会适得其反”。为了扭转和消除部分干部群众关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对立的错误认识，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生态环境是资源，是资产，是潜在的发展优势和效益”，并亲自谋划实施《浙江生态建设规划纲要》，指引浙江围绕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扎实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布局向绿色惠民、生态富民的方向不断优化。

浙江坚持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推动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清洁生产，也不能局限于‘垃圾经济’或‘废弃物回收利用’，而是要全方位覆盖到企业、区域、产业、社会等各个层面”。为了让企业真正自觉发挥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生态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完善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政策，“使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中有利可图、有力竞争”。到2006年底，浙江一举扭转自1990年以来单位GDP能源消耗水平不断上升的态势，盲目追求经济指标导致环境污染加重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物质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物质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及决策部署，为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任一任，不断丰富物质文明建设工作载体、提升高质量发展成效。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生产总值以“三年一跃升”的速度突破“七万亿”大关，达到7.81万亿元，稳居全国第四。2023年，浙江经济总量迈过8万亿大关，人均生产总值接近全国平均水平1.4倍，展现出特殊的“韧性”和更加强劲的动力。

(一)围绕“再创新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新优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热情进一步迸发

正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形成了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多年来，浙江始终坚持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的要求，聚焦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公正、透明高效、互利共赢的营商环境，从“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到“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削减政府权力事项、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加法”，全面激发个人、企业和各类组织的创业热情。2020年1月，浙江制定实施全国首部省级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浙江充分发挥为政府作用，及时出台一揽子帮扶举措，帮助企业渡过难关。2020年春天，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调研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我们将坚持不变，不能有丝毫怀疑和动摇”。2020—2023年，浙江连续四年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1个工作日，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80天”，浙企数量连续24年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居全国第一，省属国企资产总额、净资产、利润总额等指标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全体人民勤劳创新致富的路径进一步拓宽。

(二)围绕“建设创新型省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动力更加强劲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指出，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之计。浙江牢牢把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落到实处。2013年以来，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关于建设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决定》，将人才强省、创新强省作为首位战略。近年来，浙江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和创新策源地建设中成绩亮眼，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实现零的突破，创建首个全领域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人才生态最优省“金名片”越来越亮。2020年，浙江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8%，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61.8%，圆满实现习近平同志2006年在全省自主创新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到2020年成为创新型省份，基本建成科技强省”战略目标。2021年，浙江重大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奖数量上升到全国第三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1.26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62.6%，正式转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快速发展的轨道。2022年，浙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首次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四位。

(三)围绕“推进‘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调整产业结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更加高效

“调结构、转方式”，始终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抓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跳出传统产业窠臼，浙江有效提升了本土产业层次，打开了产业发展新天地，并以超长耐心和超强决心，持续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为腾出空间培育更多“吃得上、产得多、飞得远”的俊鸟，打出“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四换三名”(“四换”，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三名”，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四边三化”(在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开展洁化、绿化、美化行动)、“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一系列组合拳，启动以“亩产效益”为导向的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实施“亩均论英雄”改革，深化实施工业“标准地”、农业“标准地”改革。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举全省之力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全面部署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深化新时代“数字浙江”建设，打造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启动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浙江要坚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2021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2023年达到近2.24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五年实现翻番，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农业现代化水平居全国前列，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协调。

(四)围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竞争意识，提高做好开放工作的主动性。”

(下转第十二版)